

第 1 章 导论

区域规划是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和地方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下,被迫改变了“王朝更替”的发展轨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相应地,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发展开始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古代中国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现代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1 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的特殊意义

1.1.1 区域规划是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

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治国的基本任务就是统筹和利用国家资源,实现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目的。为此,统治者必须处理好空间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空间治理更是治国的关键。在中国历史上,空间治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是区域层面上的筹划与行动。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以及发展经济和文化,常常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和整治,其中最为著称的是水利工程,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付诸实践的区域治理工程,如陕西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四川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宁夏内蒙的河套平原灌排渠系、江浙太湖地区的运河水系和海塘等,它们带来了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也带来了国家的富强,正所谓“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

二是国家层面上统一与分裂、分与合等问题的处理。中国自然地理整体的统一性与局部的独立性相结合,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而历来统治者总是希望能“一轨九州,同风天下”^②,就一般规律来说,控制一些关键性地区往往成为空间治理中最重要的工作。例如,冀朝鼎(1936)所指出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就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封建统治者总是把基本经济区作为政治斗争中一种经济武器^③(图 1-1)。

① [明]罗贯中. 三国演义. 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 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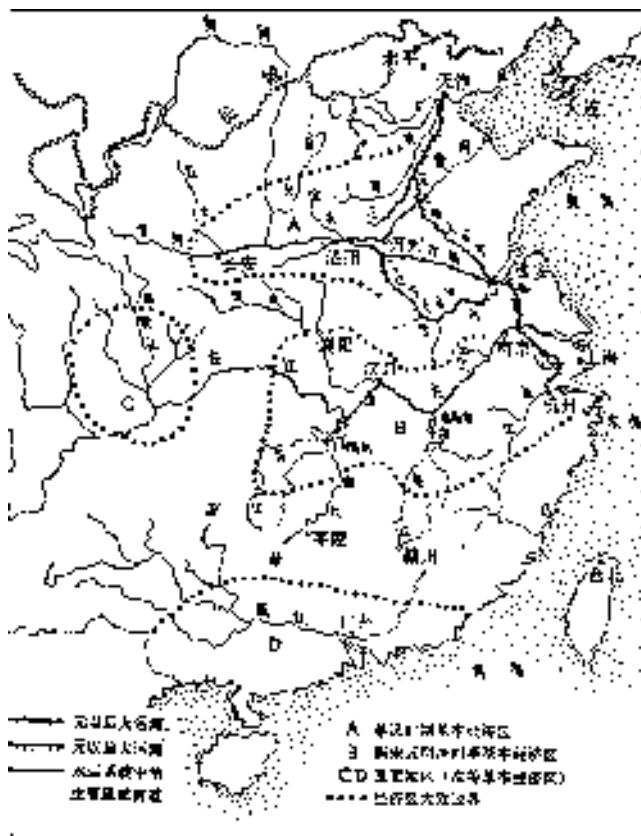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冀朝鼎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分成“基本经济区”与“附属经济区”两种。其中，基本经济区是这样—一个地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基本经济区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起着经济基地的作用。

资料来源：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本书所说的区域规划就是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基本任务是通过分配和使用空间资源来实现政策目标。正如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 1967)所指出的：区域规划研究的主题是“面向广泛的国家建设目标的空间配置关系”；区域规划的基本目标是“有助于国家政治、社会与经济空间方面在地域上实现快速整合”，主要手段就是采取“优先活化潜在的核心区域的战略”^①。

区域规划作为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在英语中，通常也含有两个空间层

^① John Friedmann, *Regional Planning and Nation-Building: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TERPLAN, Caras, 1967, 16(1): 119~129

面的含义(Roger Simmonds and Gary Hack,2000),一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增长与区域形态的意图,这些区域或多或少地高度城市化,社会与经济水平较高”,二是“国家政府平衡财富在国家扩散的努力,通常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联系”^①。

1.1.2 区域规划是国家或地方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必须研究形势与条件可能的变化,做好应变的准备,这是基本的事理,也是最基本的规划原理。面对变化的环境,规划要预为谋划,并努力引导这种变化向人们所愿意接受和希望的方向发展^②。30多年前,霍尔(Y. Dror,1973)指出了规划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关系:“一方面,规划活动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许多情况下,在受环境的控制时,规划努力加大或减小环境的影响程度。”^③所谓环境因素,可能是来自国家或区域的内部,也可能是来自国家或区域的外部。今天,规划环境动荡更加剧烈,能否灵活有效地利用国家空间资源,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评定区域规划成效的标准之一。

与一般的“技术性”规划相比,区域规划更加强调决策的“战略性”。区域规划的要义是“预防”而非“治疗”,它是为应对可能的环境变化而“未雨绸缪”,而不是等到环境变化时才“水来土掩”,正所谓“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④。尽管规划的最终目的是为采取行动以改变区域演进的趋势,但是在区域规划领域中,行动很难求速效;尽管区域规划对于眼前的情况,可能影响并不大,但是对未来的趋势却可能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区域规划是在危机尚未形成时即予以化解,因此也就自然不需要那样紧急迫切的危机处理。

区域规划着眼于未来,从远程思考。未来本是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境界,任何情况都有发生的可能,其形态与时机常出乎意料之外,因此,不能把眼光只集中在某一点上企图作精确预测,必须考虑多种不同的变局(alternative scenarios);不仅要应对旧问题寻找新答案,而且还要预见新问题。

总而言之,区域规划是国家或地方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重点选择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对地区未来真正带来变化的那些方面。

1.1.3 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具有历史独特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绵延不断,尽管有时发生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但它总能自我调适,经历震荡之后又重新恢复社会稳定与平衡。封建

① Roger Simmonds, Gary Hack. Global city regions: their emerging forms. London and New York: Spon Press, 2000: 8

② Warren Bennis, Kenneth Benne, Robert Chin. Eds. The Planning of Change,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85

③ Dror, Y. The planning process: a facet design, in: A. Faludi (ed). A Reader in Planning Theory.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6: 323~343

④ 司马相如. 上书谏. 见: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第十七. 汉纪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制度的自我调整,主要通过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来进行,即某一王朝走向衰落、崩溃而导致的封建制度政治危机,通过改朝换代的契机得以缓和、释放。总体看来,在古代中国,尽管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所变化,例如外族入侵难以抵挡,最终落得改朝换代的命运,但是并不能改变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规律。在这种规律性的改朝换代中,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累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相应地,区域规划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在一个王朝周期内,区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国家空间发展的稳定,例如,在国家层面上开展“治边”工作以保障边疆安定,建设基本经济区、发展漕运以保障国都运行,在区域层面上进行水利、交通设施建设以保障区域发展,等等。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①,被迫改变一贯“改朝换代”的轨迹。冯友兰讲“中西之交,古今之异”,中国和西方相接触,中国代表的是“古”,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西方代表的是“今”,是近代工业文明,中西之碰撞迫使中国发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国家形势看,这种转型实际上经历着两个过程或趋势:

一是“衰败化”。中国社会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则开始显露出“世衰道微”。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清帝国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之中,国家政治权威衰落,立国的经济基础农业和农村衰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内部衰败化的严重局面才真正结束。

二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西方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得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而是被迫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地位上,中国从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逐步沦为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最深刻的危机。

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双重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区域规划作为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以及国家或地方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注定要以其特定的形式,体现其时代的价值。本书即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之交、古今之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区域规划演进和发展进行初步的论述。

1.1.4 在“现代化”范式下审视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

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直围绕着“革命史”这个中心和主题而展开。客观上,在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出现过五次侵华战争(即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900—1901年的八国联军战争,还没有计算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1850—1877年以太平天

^① 李鸿章. 筹议海防折. 见:[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11. 清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本

国起义(1851—1864年)为中心的全国性的与区域性的社会大动乱更是跨时28年之久,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上半叶,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1916年的讨袁护法战争、1921—1922年的第二次护法革命、1925—1927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6年的土地革命战争、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一直到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战火不绝若线。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而不是发展与建设,在“革命史”的范式下,自然不会关心“区域规划”了,所谓的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主要被限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区域规划教科书中,多持此论,大同小异。例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合编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区域规划概论》认为:“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是伴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而开展的”,“一五”计划期间,在联合选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多学科、多部门、多任务种、联合攻关,协作配合,统一规划,协调矛盾,综合平衡,多方案分析论证的区域规划”^①;彭震伟主编的城市规划专业系列教材《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也沿袭此说^②;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编著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区域规划与分析》认为“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直到80年代才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得到蓬勃发展”^③;杜宁睿编著的高等院校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系统教材《区域研究与规划》认为:“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受前苏联区域规划的影响,是在联合选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④。

然而,随着中国现实的大变革,中国近现代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开始出现了新的进展,在“革命史”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罗荣渠,2004)^⑤。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指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显然,现代化是包括“革命史”在内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为综合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也都是围绕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据吴忠民(1999)对19世纪60年代至1949年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发展状况的分析,①除外国对中国大规模军事入侵的短暂时期外,现代化进程一直没有中断,总的来说呈持续递进状态;②现代化的进度非常缓慢,经济实力越来越落在发达国家后面;③现代化的内容很不规则,带有浓厚的畸形化色彩^⑥。可以说,在“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下,中国的区域规划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出现,早在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就在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革,除了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和实行新学制、改革旧礼俗与建立新风尚等之外,还包括建设现代市政、兴办现代工业、引进西方科学

①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同济大学. 区域规划概论.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3~4

② 彭震伟. 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50

③ 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 区域规划与分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67

④ 杜宁睿. 区域研究与规划.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3

⑤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⑥ 吴忠民. 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信事业等,这些方面都是与现代区域规划息息相关的。

1949 年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工业化与社会改革,现代化则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主导趋势^①,现代区域规划也进一步凸显起来。

1.2 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的发展脉络

在“现代化”范式下,我们可以发现,近现代中国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轨迹,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在此过程中,中国区域规划在发挥传统的空间治理的基本功能的同时,更多的是战略性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 4 个时期。

1.2.1 “实业救国”浪潮下区域规划的产生(1840—1926 年)

1840 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导致近现代区域规划产生的重大改革与思想也开始萌芽。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在旧王朝体制下自上而下地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等的沉重打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清朝皇权结构开始松弛。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清廷改革派与新兴地方实权派结合,兴办了一批官办军工企业,建设新式海军,后期扩大成为官办、官督商办、民办的资本主义型企业。可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早期工业化势头,不幸被 1894—1895 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所打断,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遭受重大挫折。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国人进一步觉醒,在“实业救国”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现代化有了长足发展。

从区域规划观点看,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专制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它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启动,而只可能由少数具有现代意识的地方社会精英在局部地区最先发动,也就是说实现区域现代化。“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掀起“共振实业”的潮流,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又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努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步入持续 10 年较快发展时期(1912—1921 年)。1895—1926 年张謇的“村落主义”及苏北沿海地区现代化实践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和杰出代表,极富探索救国、强国道路的色

^① 中国在 1964 年提出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5 年重申这个目标,反映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从 1979 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放弃 20 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实行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第三步,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彩,也是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出现的标志。

1.2.2 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区域规划实践(1911—1949 年)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49 年解放战争结束,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加深。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这是一次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然而,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迎来的却是权威失落、地方割据与社会失序的局面,内战频仍,民生凋敝。在将近 40 年的时间内,国家实效统治出现断裂,现代化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断续续地进行。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重建。从区域规划观点看,建国过程实际上是如何使分裂割据的地方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也是区域规划的时代任务。这个任务首先体现在 1918—1921 年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主要参战国正由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大量商品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孙中山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希望交战各国将大战中所投入的机器、人力移至中国,发展中国实业,于是著述《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后来改称“实业计划”,成为《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可以说,“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前瞻性的现代化计划,也是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史上最早、最完整的“全国国土开发总体规划”设想。

从 1914 年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两条道路直接影响了“一战”后,特别是 1927 年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中国内部现代化道路的斗争。国民党在南京政权建立后,逐渐转向德国式道路,以城市为据点,发展统制经济,1927—1937 年间出现经济增长浪潮,资本主义的城市化、交通现代化、农业专业化都有明显的推进;共产党则仿效苏俄模式,转向以农村为根据地,进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验。这两条现代化道路反映在区域规划发展上就是,前者开始南京“首都计划”,研究与设计实业计划,以及“九·一八”事变后为筹备抗战而进行经济基地与交通网建设等;后者则建立“苏维埃区域”,进行建国与治国的预演;此外,面对农村的破坏与衰败,一些知识精英也在各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进行地方自治的现代化尝试。

但是,从 1931 年开始,日本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内蒙古,步步扩大,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浪潮再次被中日战争所打断,国民党新政权尚未巩固就受到致命的威胁。并且,第二次中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历经百余年列强的侵略,中国已面临存亡关头,必须赢得此场战争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的基本方针,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相应地开始兴建西南、西北交通运输网,建立战时后方工业基地,为抗

日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共产党则在战争中求发展,英勇地在沦陷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无论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兴建西南西北交通运输网,还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们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壮烈的区域规划实践,集中体现了区域规划作为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的基本功能。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出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结果,而是在外力胁迫下的无奈之举和临时选择,条件异常苛刻,代价十分巨大。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中国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从此国家与区域的发展开始由衰败转向振兴。

设想战后重建是“二战”胜利前夕国际规划界的重要话题,在中国也有不少与重建有关的区域规划工作,主要包括:中央设计局以实业计划为基础,规划战后国防经济建设;在工程界,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开展对实业计划实施的研究;水利界借鉴美国 TVA,开展综合的扬子江水利工程计划(YVA);资源委员会设想战后经济建设;武汉、上海等地方政府开展大城市区域规划等。然而,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之争^①,1946—1949 年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两条现代化道路的大决战,也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冷战”在中国的鲜明反映。在此过程中,除了军事战略外,中国区域规划的发展乏善可陈,上述战后重建计划一直没有实施的外部环境,大规模的区域规划与国家建设要等到战争尘埃落定的 1949 年。

1.2.3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区域规划实践(1949—1978 年)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近百年来中国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的态势,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也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转换,中国现代化运动与区域规划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 1949 年到 1978 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在新的国家思潮影响下,中国不仅力图实现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而且力图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 29 年的时间中,中国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0 年):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仿效前苏联模式,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这是中国历史上迅速进步的时期。相应地,区域规划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与补充,其发展也出现一个高潮:从 1953 年开始,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前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联合选厂”与重点城市规划工作;1956—1957 年,为了迎接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大规模的城镇与生产力合理布局,要求“迅速开展区域规划”,并开展第一批区域规划工作试点;1958 年,中国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跃进”的客观形势要求广泛开展区域规划工作,第二批区域规划试点应运而生,规划从过去较小范围内以工业与城镇居民点为主要内容,扩大到

^①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以省内经济区(或地区)为区域范围的整个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

第二阶段(1961—1978年):随着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各地的区域规划工作也随之取消。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为加强备战,改变当时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状况,迅速进行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加之“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在发展全局上背离现代化方向,区域规划工作也完全陷入停顿状态,最后又艰难地复苏。

1.2.4 改革开放时期的区域规划探索(1979年以来)

以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动而全面的探索又重新起步。在经济发展上,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转向一种中国式的混合发展道路,基本找到了适应世界潮流、兼采各国所长的发展方式,实现了从单纯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变,区域规划也以多种形态展开,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1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区域规划发展主要是在计划体制内探索区域空间治理的有效形式,并努力寻求体制突破,包括学习欧洲经验,努力开展国土开发与整治规划;随着“市带县”等体制的实行和城镇化的发展,城镇体系规划与城市规划得到开展;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土地产生巨大需求,从农民建房到国家重点建设、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外商投资建厂房等,占用大量耕地,保护耕地资源引起重视。

第二阶段(1992—2002年):各项改革由过去侧重突破旧体制转向侧重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步,区域规划也开始逐步演变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搞得热火朝天的国土规划,由于未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趋向消沉和衰变,进入低谷阶段;而原功能较单纯的城镇体系规划转向以城镇体系发展为主体,与相关要素进行空间综合协调的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在较大程度上接替了衰变前的国土区域规划。与此同时,以城市发展为核心的空间战略规划/概念规划,以基本农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利用规划开始兴起。

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开始启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进程,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进入结构转型时期,科学发展观对改革开放道路进行批判性反思,客观上需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区域规划呈现多种探索形式并存的格局,包括“十一五”规划把区域规划放在突出的位置、开展城市规划的区域研究与加强区域城镇体系规划、重视国土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等。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划既相互补充,又存在矛盾冲突。

1.3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

综观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的发展,可以发现它与西方区域规划有着相当的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从国际视野来认识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发展的学术价值。

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从鸦片战争至今的 160 多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解体,城乡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显现出复杂的过渡社会特征,这也正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①。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逐步纳入世界体系,中国发展也成为世界史一部分,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区域规划也与西方区域规划有着一定的可比性。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起源、演进及其未来趋势,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区域规划发展特色的理解。

1.3.1 现代世界区域规划的发展

从国际上看,区域规划起源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的关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近来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推进,又出现新的特征。据此,我们可以将现代世界区域规划发展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1) 工业革命催生了欧美国家早期的区域规划思想

区域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人们通常将其历史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城市病”的诊治。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区域规划思想,渊源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无限制的工业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最早在欧洲,后来到北美,一些“先知者”(seers)开始认识到这并非单纯的城市自身的问题,实际上与工业革命以及快速城市化相联系,需要通过整体的规划予以解决。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一些重要的运动、会议、规划为标志,区域规划思想逐步酝酿并缓慢发展。可以说,在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催生了早期的区域规划思想。

(2) 20 世纪前半叶西方区域规划思想初步形成体系

自 1898 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思想到 1945 年“二战”结束的 50 多年时间内,世界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 20 世纪 30 年代又经历了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些因素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区域规划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事实上却为区域规划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战争破坏了世界,战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区域规划来指导;萧条带来了区域经济衰退,旨在振兴区域经济的区域发展规划也为衰退地区所亟需。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努力,区域规划思想在 1945 年已经初步形成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能够从总体上对全国和各个区域发展做出宏观的规划(从 1928 年开始,苏联经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迅速从一个农业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资本主义国家因加强干预而增加对各个区域发展规划的比例(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公众承诺,实行“新政”,把已经被“大萧条”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美国解救出来)。在此期间,世界上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区域规划,包括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大城市区域规划、以工业区为核心的工业区域规划、以完整的流域单

^① 罗荣渠.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 见: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